

论抗战初期的“新运妇指会”

李红梅

(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抗战爆发后,为了联合各界妇女团体,团结和动员广大妇女积极投身抗战,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新运妇指会)进行改组。改组后的新运妇指会,设立了慰劳、儿童保育、战地服务等小组,成为全国性的领导和动员妇女参加抗战的总机构。各小组在新运妇指会的领导下,积极宣传抗战、抢救难童、慰劳伤兵、训练妇女,为支援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抗战初期;新运妇指会;宋美龄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7)02-0180-05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新运妇指会”)是“新生活运动”的一个分支机构。抗战爆发后,为了联合各界妇女团体,团结和动员广大妇女积极参加和支援抗战,新运妇指会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新运妇指会,吸收了一批公开和未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以“动员妇女群众投入抗战建国”为工作纲要,积极动员广大妇女参加抗战,成为抗战初期国统区妇女界最重要的妇女团体。

一、新运妇指会的改组

1933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被粉碎后,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策,即在加紧军事进攻的同时,在政治、文化、思想等各方面进行反共。为此,蒋介石于1934年2月首先在南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为了统一领导和推进全国的新生活运动,蒋介石还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并自任会长。1936年2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下设妇女指导委员会,即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由宋美龄亲自担任指导长,领导全国妇女进行新生活运动。并在各省设立分会,由各省的省主席夫人分别负责。

全面抗战爆发后,各界人士包括广大妇女积极投身于抗战。各抗日妇女团体不断涌现,其中以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1937年7月7日)、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1937年8月1日,简称慰劳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1938年3月10日)影响最大。

但由于各妇女团体各自开展抗日活动,未能分工合作,成效不够明显。为了促进全国妇女界参加和支援抗战,在中共长江局妇委和各党派及社会各界知名爱国人士的推动下,新运妇指会进行了改组。

1938年5月,身为新运妇指会、慰劳总会和战时儿童保育会最高领导人的宋美龄,函请各党派、各团体、各地区的妇女领袖及代表人物50余位,赴庐山参加战时妇女工作谈话会。出席谈话会的妇女代表有:国民党代表沈慧莲、刘蘅静、唐国桢、徐闾瑞等;基督教代表张蔼真、陈纪彝、邓裕念等;救国会代表史良、沈兹九、刘清扬等;中共代表邓颖超、孟庆树等;社会知名人士代表李德全、俞庆棠、吴贻芳、雷洁琼等。谈话会一致通过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并决定对原新运妇指会进行改组,与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和战时儿童保育会妇女组织协同合作,成立全国性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新运妇指会),作为动员领导全国妇女参加抗战建国的总机构^{[1]61}。7月,新的新运妇指会正式成立,以宋美龄为指导长,宋蔼龄、李德全、马沈慧莲、陈谭曼意、吴贻芳、张肖梅、曾宝荪、郑毓秀、刘蘅静等9人为常委,以马书城夫人、王保志宁、郭秀仪、邓颖超、康克清、伍智梅等36人为委员^[2]。

二、新运妇指会的组织架构

改组后的新运妇指会下设总务组、文化事业

* 收稿日期:2006-04-20

作者简介:李红梅(1975-),女,山东济宁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组、训练组、生活指导组、生产事业组、慰劳组、儿童保育组、战地服务组和联络委员会。1939年10月,增设乡村服务组,1941年3月,将战地服务组合并入慰劳组^{[3]25}。

各组的分工如下:总务组总理一切对内对外事务;儿童保育组负责收容、保育战地儿童;训练组负责训练、培养妇女干部,使其能够动员、领导更广大的妇女参加抗战;慰劳组(后包括战地服务组)负责征募捐款、医疗器械、药品、衣物,到前线战地、乡村及野战医院去救护、看护、协助军队运输、传递信息、

慰劳等;生活指导组主要帮助广大妇女、抗属寻找工作,指导她们的生活;文化事业组负责出版会刊、提供各组、各省工作队和妇女工作委员会所需资料,为各工作组汇报工作、交流经验的平台;生产事业组负责动员广大妇女加强农业生产、进入工厂生产,支持抗战;乡村服务组主要到后方农村去,宣传抗日,提高民众的觉悟,辅导他们的生活和生产;联络委员会负责新运妇指会与国内外其他团体的联络。新运妇指会以张蔼真为总干事,以谢兰郁、刘清扬、沈兹九、黄佩兰、俞庆棠、唐国桢等人为各组组长。

表1 妇指会各主要负责人名录

职务	姓名	学历	经历
总干事	张蔼真	美国密西干大学硕士	上海清心女子中学校校长,福建省立实验学校校长,女青年会全国协会董事兼会计,南京国际妇女会副会长,国际友仁社南京支会副会长,中国妇女慰劳总会执行委员。
总务组组长	谢兰郁	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毕业	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兼秘书主任,南京女子中学教员,中国妇女慰劳总会执行委员兼慰问部长,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兼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
训练组组长	刘清扬		北平市党部妇女部长并任国民会议促成会常务委员,中央妇女部训练股主任,中央妇女党部训练班训育主任,汉口市党部妇女部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兼运输委员会副主任及经济委员及监察委员。
文化事业组组长	沈兹九	日本女子高师毕业	《申报》妇女园地编辑,妇女生活半月刊主编,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
生活指导组组长	黄佩兰	北平中国大学毕业	中央党部妇女部干事,江西省党部妇女部秘书,江苏省立南京女子中学初中部主任,陆军第20军团干部训练班女生队长,31集团军政训处总干事。
生产事业组组长	俞庆棠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士	大夏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副教授及教授,前中央大学区扩充教育处处长,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中国教育社总干事。
慰劳组组长	唐国桢	北平女师大毕业	湖南衡山县立女校校长,宁夏省立女中校长,南京市党部总干事,中央社会部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国妇女慰劳总会执行委员,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妇女共鸣社经理。
战地服务组组长	陈逸云	美国密歇根大学市政管理硕士	国民政府司法院秘书,南京市党部妇女部部长,铁道部专员,妇女共鸣社编辑,中央社会部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国妇女慰劳组总会执行委员,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
儿童保育组代理组长	钮珉华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学士,美国克度大学硕士	江苏省政府秘书,江苏省党部妇女部部长,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经济干事,上海女青年会董事,战时儿童保育会总干事。
联络委员会主任委员	史良	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科毕业	总司令部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指导员,江苏省区长训练所训育员,江苏省妇女协会常务委员,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参政员。

资料来源:《附录》,《妇女新运》创刊号,1938年12月版,第2页。

此外,新运妇指会还在各省设立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以各省的省主席夫人主任委员。

改组后的新运妇指会,有了以下变化:一是建立了战时工作体系。妇指会实行指导长领导下的

总干事负责制,增设常务委员会,扩大指导委员会委员;设立与战时工作联系密切的小组,并与慰劳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进行紧密协作。二是领导层增加了各团体代表和进步人士,如中共代表邓颖超、

康克清、孟庆树等为指导委员，总干事张蔼真、联络委员会主任委员史良、文化事业组组长沈兹九、训练组组长刘清扬等均为进步人士，只有生活指导组组长黄佩兰、慰劳组组长唐国桢、战地服务组组长陈逸云为国民党员。而在各个工作部门中，则有更多的进步青年和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1]63}。

三、新运妇指会的工作开展

抗战初期，新运妇指会领导各小组，主要做了以下几项重要工作：

(一) 抢救和保育难童

抗战爆发后，日军残暴侵略下的中国，家破人亡，儿童流离失所，有的甚至被抓到日本去接受奴化教育。新运妇指会领导保育组和战时儿童保育会密切协作，从战地火线上抢救难童，然后将其转送到后方安全地区，安置在保育会设立的儿童保育院，由他们进行抚养、教育。

保育会成立后，首先是在各地筹设分会，以扩大儿童保育工作。在保育会号召下，各地热心战时儿童工作的妇女，纷纷响应，筹设分会。江西妇女界首先于1938年4月1日成立分会。随后，广东、四川、安徽、香港、福建、广西、贵州、浙江、湖南、河南、陕甘宁边区相继成立了分会。

其次是筹设保育院，以收容难童。保育会成立后，立即在各地筹设儿童保育院，在交通便利、邻近战区的场所，设立临时保育院，在内地设立永久保育院。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是最先成立的，自1938年3月29日正式收容儿童起，至1938年9月底止，收容难童总数达7000余人。至武汉沦陷前，汉口临时保育院共送出28批难童，经宜昌接运站（为便利转运儿童，在宜昌设立连接站）运出难童1.5万名。长沙、重庆、安徽相继也成立临时保育院。至1940年3月，新运妇指会共设永久保育院45个，其中直属保育院8个，四川分会8个，广东分会6个，成都、贵州分会各4个，湖南、香港分会各3个，浙江、江西、广西分会各2个，福建、陕西、陕甘宁分会各1个，共收容、保育难童14034人，最小的难童不到2岁，最大也不过10岁^[4]。至1940年12月底，保育院收容的难童增加到24999名^[5]。

第三是广泛举行征募运动。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经费，主要靠募捐而来。1938年4月11日，宋美龄亲自撰写《谨为难童请命》一文，号召全国各界人士为难童捐助经费，并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纷纷认捐难童的保育费，或捐款、捐物。儿童保育会经济委员会正、副主任李德全、郭秀仪积极带

头，李德全认捐了511名儿童的生活费，郭秀仪认捐了442名儿童的生活费。宋美龄和蒋介石每人也认捐了200名儿童的生活费。邓颖超、史良、刘清扬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亦纷纷认捐。文化、教育、金融等各界人士，家庭妇女、老太太、小学生等都踊跃捐款。“伤兵之母”蒋鉴女士则拿出全部家产捐给保育院。宋美龄在香港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也积极捐募资金、物质支援儿童保育工作。海外华侨为难童捐献了大批医药、食品、衣服等物资。征募工作还得到英、美政府救济机构的帮助，并获得70余万元捐款^[4]。此外，行政院财政部为提倡儿童保育，每月津贴3000元^[6]。

四是编辑战时读本，以教育难童。为了不耽误难童的学习，保育院采取多种形式对儿童进行教育。保育会自己编写《抗战建国读本》的同时，还请教育设计委员会编写《教育实施大纲》分发至各院，对难童进行教育。大纲包括基础知识的学习、抗战爱国教育和简单劳作技术的培养^[7]。保育院大多开设小学班，个别有初中班。小学或初中毕业后，成绩优良或有特殊天才的，保育会辅导他们升学，使他们能受到更高的教育，或根据其特长分发至各工厂习艺^[8]。抗战期间，战时儿童保育会与保育组先后在全国各地成立了20多个分会，建立了61所战时儿童保育院，共收容保育难童3万余人^[9]。

(二) 训练培养妇女干部

宋美龄在庐山妇女谈话会发布的《告全国女同胞书》中说：“女界服务人员的缺乏，为大家所公认，必定先要训练干部工作人员，才能到各处去推动一般妇女民众。”^[10]因此，新运妇指会改组后，由训练组开设训练班，培养妇女干部和工作人员。

训练组先后举办了三种干部训练班。第一种是新运妇女干部训练班，专门为妇指会各组培养干部人员，共开办5期。1938年7月25日，第一期在汉口首先开班，学员59名，多为高中或大学毕业，训练期一个月。有47人顺利结业，被编为新运妇女乡村服务队，分发到湖北黄陂、孝感、云梦、应城四县，深入乡村，进行宣传工作。第二期开设于1938年10月1日，学员100人，培训3周后因武汉沦陷而结束，其后全体学员分发到湘桂、粤汉铁路沿线各县乡村服务。第三期开设于1939年6月至7月，学员444人。第四期开设于1939年11月，学员188人，训练期6周。后两期600多名学员结业后，被分别派到乡村服务队、战时服务队、工厂服务队、生产事业组、儿童保育会工作^{[11]30}。1941年11月，开办第5期，招收学员32人，受训3个月。结

业后编为第 10、第 11 乡村服务队,分发至江安、合川二县从事乡村工作^{[12]28}。第二种是新运妇女高级干部训练班,专门训练各省妇女工作干部。因环境所限制,仅办了一期,学员 128 人。培训期 1939 年 2 月至 5 月,集中在重庆受训。其中 111 人是中央党部及山西、四川、甘肃、安徽、江西、陕西、贵州、湖北、湖南、福建、广西等 11 省省政府保送。17 人由妇指会本会考取,学员大半是大学生或肄业生,且有相当妇女工作经验者。结业后,除 10 余人留妇指会工作外,其余回本省服务^{[11]30}。

第三种是新运妇女救护人员训练班,共开设两期。第一期开办于 1940 年 1 月,学员 41 人,受训期满后分发到战时服务队,在川东、长江沿岸伤兵医院服务。第二期开办于 1940 年 12 月,学员 81 人,结业后编为伤兵之友社总社服务队,在嘉陵江及川西长江沿岸医院服务^{[11]31}。

(三)开展慰劳和募捐活动

新运妇指会改组后,成立慰劳组,专门负责伤兵的慰劳工作。为统一慰劳工作,以提高效率,慰劳组与慰劳总会合并办公,慰劳组组长兼任妇女慰劳总会的总干事。武汉时期,宋美龄就经常带领慰问组到前线和伤兵医院进行慰问。武汉失守后,宋来到长沙,组织湖南妇女为伤兵缝制被褥和衣裤。迁到重庆后,妇指会将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的女职员及家属组织起来,成立各机关新生活妇女工作队,开展慰劳工作。同时在湖南、广东、江苏、浙江、

陕西、甘肃、江西各省,以及纽约、伦敦、巴黎、菲律宾等海外各地相继成立慰劳分会^{[13]41}。慰劳组的妇女们亲自制作慰劳品,组织荣誉军队服务队,前往各医院慰问^{[13]41}。她们的慰劳活动,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士气。

新运妇指会在慰劳伤兵同时,还积极开展募捐活动。1939 年的“三八”节是妇指会改组后的第一个妇女节,据不完全统计,妇运会共收到各地妇女捐款 500 多万元^{[1]68}。自 1938 年 7 月到 1941 年 7 月,三年间妇指会共发动了 6 次大的募捐运动,到 1941 年 5 月底,共收到物品代金 1 500 余万元,金银首饰 500 余两,布鞋 3 万余双,军衣棉衣数 10 万套,药品 20 几种^{[3]26}。其中,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一次就捐了 10 万美元^[14]。

(四)开展妇女教育,宣传抗战

为了提高妇女的文化程度,唤起她们的民族意识,增强战时常识,新运妇指会所属文化事业组,积极筹办女工识字训练班。先后举办了 27 个女工识字训练班,招收 1 000 多名学生^{[12]28}。识字训练班的教育内容分为识字教育和普通技术训练,主要涉及公民教育、政治常识、民族意识、救护、防空、防毒等常识^[15]。此外,文化事业组还编辑出版《新运妇女周刊》、《新运妇女月刊》等各种刊物,进行抗战宣传^{[3]33}。这些刊物,为各组汇报工作,交流经验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并对宣传、教育和动员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文化事业组历年出版刊物及数量统计表(1938 年 7 月—1948 年 6 月 7 日)

号数	刊称	创刊时期	出版数量	备注
1	各纪念日宣传大纲	1938.7	65 次	
2	壁报资料	1939.4	300 期	
3	妇女新运月刊	1940.1	54 期	
4	妇女新运丛书	1944.6	5 种	
5	妇女新运季刊	1938.9	9 期	
		1947.6	1 期	
6	妇女新运周刊	1939.1	233 期	附中央日报刊登
7	妇女新运通讯半月刊	1939.9	54 期	
8	时事研究资料	1941.1	39 期	
9	妇女新运双月刊	1943.1	20 期	附渝商务日报刊登
10	妇女文化月刊	1944.6	6 期	附渝时事新报刊登
11	Glimpses of ite Chinese Women's Wartime Work	1946.12	2000 本	
12	工作八年	1947.6	3000 本	
13	九周年纪念特刊	1947.7	3000 本	
14	进修资料	1947.10.25	6 种	
15	民众读物小丛书	1947.6.15	2 种	
16	幼儿保教小丛书	1947.6.15	12 种	

资料来源:《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十周年纪念特刊》,1948 年,第 37 页。

四、新运妇指会工作之评价

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战时的特殊情形,新运妇指会进行改组。改组后的妇指会吸收了大量的

共产党、救国会、基督教教会、无党派等各团体妇女代表参加,使其由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内部组织扩大为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全国性妇女组织。抗战初期的新运妇指会,不仅在组织系统和组织运作上,而

且在妇女政策和工作内容上都有了较大变化,突出了战时特点,强调抗战救国,成为战时中国动员各界妇女参加抗战的总机构。抗战初期,新运妇指会所领导的各小组,在抢救难童、训练干部、征募钱物、慰劳伤兵等各项抗日救亡活动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动员和团结广大妇女参加抗战。抗战爆发后,全国妇女踊跃参加抗战,但缺乏统一的组织与领导。新运妇指会改组后,使战时妇女工作有了自身的领导和组织,大大推动了全国妇女特别是国统区的妇女参加抗战。妇指会训练的妇女干部深入前线 and 后方,慰劳伤兵、征募钱物、宣传抗战,号召各界妇女支援抗战。此外,新运妇指会与平民教育促进会、全国女青年协会等各团体建立起密切联系。至1944年底,妇指会共与400多个妇女团体建立了联系^[16]。

其次,抢救、保育难童,功在千秋。抗战时期,无数的儿童流落街头,无家可归。儿童是国家的未来,为了抢救和保育这批难童,新运妇指会和保育会合作,从前线抢救难童,建立临时保育院,再通过中转站运送到后方,在大后方建立永久性保育院,进行保育和设班教学。这一整套的措施,在抗战时期为抢救保育难童起了重要作用,先后共收容保育3万多难童^[4]。战时保育的难童,很多后来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人才。

再次,新运妇指会为动员乡村民众支持抗战起了一定作用。抗战时期,不少地方基层组织不够健全,偏僻的乡村民众并不了解政府抗战的方针政策。新运妇指会所领导的乡村服务组深入后方农村,辅导民众生活,帮助民众生产,积极宣传抗日,对提高民众的觉悟,沟通政府与民众间的隔膜起了一定作用。

抗战初期,新运妇指会所领导的各个小组,在国破家亡、战火纷飞的情形下,克服人员有限,经费

不足,衣食、医药奇缺等困难,奔波于战区前线与后方乡村,在抢救难童、训练干部、征募钱物、慰劳伤兵、宣传抗战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遗憾的是,抗战中后期,由于受到政治气候的影响,迫使许多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相继离开新运妇指会,严重影响了其抗战救亡的工作成效。

参考文献:

- [1] 刘静,萧扬. 抗战初期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J]. 武汉文史资料,1994(3).
- [2] 妇女新运. 创刊号,附录,1938:1.
- [3] 张蔼真. 三年工作总结[J]. 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三周年纪念特刊,1941.
- [4] 战时儿童保育会统计资料[G]//社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案卷号11-559.
- [5] 儿童保育的过去现在及未来[G]//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三周年纪念特刊,1941:45.
- [6] 战时儿童保育组述要[J]. 妇女新运(季刊创刊号),1938:45.
- [7] 五个月来的战时儿童保育[J]. 妇女新运,1939,2(3):62.
- [8] 熊芷. 六年来本会工作总报告[J]. 战时儿童保育会六周年纪念刊,1944.
- [9] 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编. 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八年[M]. 南京印书馆,1946:139.
- [10] 刘清扬. 回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J]. 文史资料选辑,第85辑.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60.
- [11] 三年来本会的干部训练工作——训练组工作报告[J]. 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三周年纪念特刊,1941.
- [12] 本会五年工作之回顾[J]. 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五周年纪念特刊,1943,5(7).
- [13] 三年来的慰劳事业[J]. 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三周年纪念特刊,1941.
- [14] 慰劳总会慰劳捐款[J]. 社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案卷号11-51.
- [15] 文化事业组的工作点滴[J]. 妇女新运,1938:23.
- [16] 新运妇女指导会工作开展情况[J]. 社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案卷号11-833.

责任编辑 张颖超

On the Women Directory Commission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Promoting Committee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LI Hong-mei

(Research Center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broke out,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public women's groups, solidify and mobilize the women to fight against the invading enemy actively, the Women Directory Commission of the General New Life Movement Promoting Committee was reorganized. After reshuffling, it established the groups of comforting, the group of children caring, and the group of battle service etc, and it became a nationwide organization that led and mobilized the women to fight against the invading army. Each group,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organization did major contributions to support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such as mobilizing publicity to fight against the invading army, rescuing kids in need, and comforting wounded soldiers and training women, etc.

Key words: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Women Directory Commission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Promoting Committee; Song Meiling